

# 全球化与文化： 西方与中国

王宁◎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全球化与文化： 西方与中国

王宁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王宁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6

ISBN 7-301-05643-5

I. 全... II. 王... III. 经济一体化—影响—文化—文集  
IV. G-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该字(2002)第 036064 号

书 名: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

著作责任者:王宁

责任编辑:江溶

标准书号:ISBN 7-301-05643-5/G·072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发行部 62754140 邮购部 62752015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mm×1168mm 32开本 11.375印张 285千字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2.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目 录

全球化与文化:对峙还是对话?

——编者前言..... 王宁(1)

## 第一编 全球化:从经济走向文化

西方视角下的全球性..... [英]罗兰·罗伯逊(17)

寻找东亚认同的“西方”..... [美]阿里夫·德里克(29)

大都市..... [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49)

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知识”与“再阐释”

..... 叶舒宪(67)

全球化·市民社会·民族主义..... 王逢振(87)

## 第二编 全球化与文化

论全球化和文化.....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05)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及影视传媒的功能:中国的视角

..... 王宁(122)

文化之战..... [英]特里·伊格尔顿(143)

全球化的文化挑战..... 张颐武(154)

全球化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命运..... [美]J.希利斯·米勒(171)

走向新世界主义..... [荷兰]杜威·佛克马(186)

世纪末·“全球化”·文化操守..... 盛宁(204)

### 第三编 全球化与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

- 比较文学的全球化 ..... [美]理查德·布劳德海德(225)
- 全球化时代文学遭遇、文化身份及主体性的挑战  
..... [加拿大]米兰·迪米奇(237)
- 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 王宁(262)
- 现代性与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的历史化..... 陈晓明(278)
- 市场模式的大学比较文学的命运..... [美]迈克尔·霍魁斯特(301)
- “全球性”境遇中的中国文学..... 王一川(321)
- 全球化、文化认同与后殖民批评 ..... 陶东风(340)
- 后记..... 王宁(359)

# 全球化与文化:对峙还是对话?

## ——编者前言

正如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的,在当今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而又使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这一现象正在日益影响和波及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从近几年来中国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全球化这个字眼出现的频率之高也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传媒全球化,当然也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文化上可能出现的全球化趋势。应该承认,这决不是耸人听闻的宣传,而是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当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必然会反映到社会文化等相关领域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实现,这种迹象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经济全球化给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的全球化或趋同化现象,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的现象,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因而全球化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遭到一些抵制和反对就不足为奇了。本书的编选并非旨在鼓吹一种文化上的全球化,而是要探讨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些客观现实,以便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和文化研究学者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鉴于全球化在经济学界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又逐步引起了政治学者们的关注,而它受到文化学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则是近几年里的事,在这方面收入本

书的两位西方学者的论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罗兰·罗伯逊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如果我们将全球化当作一种历史和文化批评话语,那么它所显示出的对有着鲜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的强有力消解和批判作用就应得到关注。同时,它作为现代性话语的对立物,与现代性以及其自然的延伸和悖逆——后现代性又有着某种反拨和交合作用。这也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始自哥伦布 1492 年发现新大陆的资本在全世界的运作和扩张过程,这一过程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达到了高潮,它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显然,全球化曾在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 1492 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也即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伟计划,在这一宏伟的计划下,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计中的一个普通角色;其二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现象,也即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但是这种“世界的文学”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特色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

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明确而且也不可能指明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但却已经隐隐约约地向我们揭示了,全球化的现象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样一来,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所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也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

到这些地区;但随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的现象。对于这后一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西进过程见出例证。毫无疑问,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不可能不受到文化本土化势力的抵制,而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因而,只看到文化上的趋同性而忽视其多元发展走向显然是片面的。

就我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学术话语中,全球性话语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取代了现代性/后现代性二分法,成为一个可以覆盖这两种学术话语的新的视角。它在文化上的一个直接反映就是文化研究的崛起以及其对传统精英文学研究构成的挑战。因而毫不奇怪,一些对文学研究情有独钟的学者面对这样的情形,十分担心文化研究会把已经日益萎缩的文学研究吞没了,因而他们试图通过打压文化研究拯救文学研究自身的命运,我认为这大可不必。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只能是导致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更为严重的对立,最后也可能导致文学研究的消亡。

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来看,全球化与其相对立的本土化既有着对峙的一面,同时也有着交合和相通的一面,也即如罗兰·罗伯逊所说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出现: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据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尤其在文化领域中最为明显。因此,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它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征,若想掩盖或抹去这种特征,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衰退。由此可见,全球化只有通



过本土的接受和实践才能得以实现,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所准备。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成为现实,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将自己正式融入世界大家庭中去了,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 and 文学研究者们所必须正视的事实。诚然,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面前,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全球化将给中国的文化和知识生活带来何种影响?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我们有可能为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而有所作为吗?在文化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消亡吗?对上述种种问题,本书的各位作者都从自己各自的角度作了回答。

当然,应该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学术界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方法和话语模式。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在英语世界崛起的,它的研究对象并不是那些写在书页里的高雅的、精致的文化产品——文学,而是当今仍在进行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特别是那些在精英学者那里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但一个事实却是无法否认的,即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也出自文学研究,特别是在 F.R. 利维斯(F.R. Leavis)那里的文化研究仍有着鲜明的精英意识。而后来的文化研究之所以能走向大众文化和当代社区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走出了利维斯主义的狭隘精英文化领地的结果。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均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文化研究经过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争鸣和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介入,已经包括了这样几个方面:以边缘和第三世界未开发地区为主的区域研究,以后殖民地的写作/话语为研究对象的种族研究,以探讨女性文化和建构女性话语为

主的性别研究和性别政治,此外,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面对影视传媒对文学的冲击以及当代高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文化研究还应当包括影视和传媒研究。尽管目前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之命运的担忧竟对文化研究抱一种敌视的态度。但在我看来,二者并非应当全然对立,若是着眼于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我们则不难看出,在当前的西方文学理论界,早就有着相当一批著述甚丰的精英文学研究者已经自觉地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从而可以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来研究文学。我以为这种方向是使我们走出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二元对立之死胡同的必由之路。这对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也有着一定的启发。

当然,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也使得有着悠久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潮再度受挫。实际上,20世纪的西方文学界和文化界已经经历了以人为研究中的三次大的转折,也即人文主义、反/非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毫无疑问,现代主义仍是弘扬人文主义的,而早期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反人文主义的,到了后工业的高科技时代,信息生产取代了传统的工业生产,人的作用受到了限制,人的作用再也不像启蒙时期那样强大,而是成了一种“后人”(post-human)。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往往从一种身份发展为多重身份,人的主观能动性正越来越受制于高科技和互联网的作用。因此重提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对于弘扬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我认为,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现同时带给了我们两方面的影响:其积极方面体现在,它使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更为直接地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从而使得经济建设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更为密切;而消极的方面则体现在,它也使得精英文化生产,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创作,变得日益困难,如果处理不当,最终有可能导致新的大众/精英文化的等级对立。因此,面对全球化的强有力的

影响,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策略是,首先要顺应这一潮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下,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通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一方面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另一方面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对西方学术界的固有思维定势产生影响和启迪,最终达到消解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之目的。

既然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在国际学术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对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课题有所了解,并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这种论争性的对话中,通过和国际学术同行的讨论、争论和对话达到影响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之目的。这就是本书编者的一个明确目的。我们当然可以从本书所粹集的中西方学者论述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论文中看出一个趋势,即我们中国的一些前沿学者的研究已经基本上接近国际水平,他们的论文若用英文撰写,定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本书的编选只是编者所试图实施的文化全球化战略(暂时借用这个说法)的第一步。毫无疑问,在自然科学界,科学家们已经达成一种共识:能否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并收入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学论文索引)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发达与否的客观标准。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际权威性的 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论文索引)、A&HCI(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科学论文索引)检索系统对绝大多数学者还相当陌生,不少学者的这种国际意识仍十分模糊,他们仅满足于利用外文资料向国人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而不能与西方同行进行讨论和对话,因而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领域内实际上存在的“逆差”现象。中国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学者在国际论坛上的声音却很微弱呢?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人类一些共同关切的前沿理论话题需要

我们共同去探讨。因而在理论上的创新也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当然语言问题也很重要,在把中国文化学术的最新成果推向世界时,我们不得不暂时借用出自西方但目前已成为国际通用的语言——英语。我认为即使我们讲的是英语(全球的),但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仍是中国的(本土的),这也决不会使我们的文化被殖民,与其相反,倒是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传播到全世界,从而使得中国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劲。

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文学理论及批评实践中:传统意义的文学理论之范围变得越来越宽泛,它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含义更广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所取代;另一方面就是文学批评的萎缩和文化批评的崛起,后者显然已对前者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走向,并不只是空发一些议论,而更应该结合我们各自所从事的专业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意义的方案,我在此所要提出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文学研究日益萎缩的局面,我们应当弘扬一种新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这种研究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就其当代形态而言,西方的各种文化研究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进行多种阐释的可能性资源,并且作为我们应用于研究实践的工具。当然,我们对这个工具的态度是惟我所用,也即既借鉴它来分析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同时又从中国的文学现象出发对西方的各种文化理论进行质疑、改造甚至重构,最终旨在建立自己的文化研究理论。因此借用全球化的路径,我们可以这样来描绘:(来自西方的)理论旅行在经过立足本土(中国)的批评实践之后又实现一种(始自中国的)理论的回归。但这样的回归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复归,而是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建构性、创造性回归,它不仅可用于中国本土的研究实践,同时也足以为国际文化研究界所参考借鉴。一般人总认为,文化研究在

中国已经变了型,它一味向大众文化献媚,因而丧失了文化研究在西方语境下所固有的批判性特征。这种批评虽不无偏激,但对我们却是十分中肯的。在西方语境下所具有的批判性、意识形态性和解构性的文化研究,在运用于东方语境时会不会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形成对立?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在从事文化研究实践时,我们要正确看待文化研究与传统的(人文)文学研究的关系。在这方面,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决非对立,而是一种对话和互动关系: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课题,开阔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而文学研究的扎实的文本知识则使得文化研究者不至于脱离文本实践而空谈大而无当的文化。应该承认,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不同方法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地,使之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游刃有余。当然,我还想指出,在我们的文化研究中,我们要区别国际化与西化的界限,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的文化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就全球化在大众传媒领域内的巨大影响而言,它使英语世界以外的人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在未来的世界,要想有效地生存下去,不会英语恐怕寸步难行,你根本无法得到互联网上的信息。同样,在理论批评领域,“失语症”(loss of discourse)还有可能发展为“失声症”(loss of voice),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将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竟不为(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外)世人所知;而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文化通过英语的中介长驱直入渗透到我们的批评话语中。这样一种局面是令人悲哀的,它同时也会激发我们的奋进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化的发展并不一定要与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未必能产生出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倒是有可能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但艺术家的想象力异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不朽的艺术珍品,这已被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的崛起所证实。因此在文学的文化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也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后者进行对话,“失

语症”现象的出现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西方语言的媒介来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建构自己独特的研究话语，就将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推广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我认为这正与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积极对策相吻合。

下面，我利用余下的有限篇幅将本书各篇论文作一简略评介。

第一编“全球化：从经济走向文化”粹集了几篇从文化角度来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论文。罗兰·罗伯逊作为当今国际公认的权威性学者，在把全球化这个术语广泛应用于文化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为本书提供的论文试图使用一个新的术语“全球性”，在他看来，实际上“全球化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尽管并非没有问题的、对于人类当前状况的特征表述。在这方面，许多学科在有关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性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争议。事实上，要想描绘全球性的整体轮廓而不把它置于（用当前的术语说）这一系列主题中，并不是完全可能的。同理，我们也不可能忽视与全球性有关的本土性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关于全球化以及最近几十年来所谓现代性的相关问题的论争中，这二者经常被（尽管是非常简单化地）看做是相对的。事实上，全球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尤多争议，主要在于：有人声称全球化过程与全球性状况意识是现代性的后果，而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全球化是不同种类的现代性在世界不同地方兴起并传播的先决条件”。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中国学者王一川的响应，王的文章的出发点是中国的本土实践，而他对基于中国实践的全球性的阐述实际上和罗伯逊形成了一种对话，并有力地解构了全球化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

阿里夫·德里克是近几年来活跃在学术界的一位全球化研究者，他一方面对全球化所隐含的某种西方文化霸权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又以某种理想化的方式勾画了一幅全球化的图景。在本书中的这篇文章中，他对追求某种“亚洲认同”的东方学者提

出了忠告,他认为,“全球化作为一种范式,其本身的涵义仍然是相当不确定的。它曾一度是对重新构建世界之过程中的某些变化的一种描述,同时也是试图使以新的面目出现的老的霸权得以永存的一种新话语,正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也即美帝国主义的一种转世化身。然而,不管它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它都在提出有关现代性的目的论方面与早先的现代化话语分道扬镳,因为那种目的论作为历史的终结而暗指欧美国家,同时这种分离也体现于向作为政治组织之主要部分的民族的猛烈抨击。”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则用一种文化随笔的笔调揭示了全球化给印度带来的某种后果:“在一个经济重组的后殖民国家里,国家脆弱的经济和跨国资本之间的障碍正在一片和平的喧嚣声中被拆除。当远程通讯发展到后现代阶段时,非殖民地化的现代性之梦正在被世界贸易组织的化解危机行动所阻断……在经济重组中,这种代价太高且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的努力终于行将消失。”显然,斯皮瓦克作为一位印度裔美国学者,她的第三世界经验对于她在第一世界学术界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在这一编中的两位中国学者的文章则把这种第三世界经验拓展到了斯皮瓦克所不熟悉的中国,并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阐述世人普遍关注的全球化问题,这不能不对西方学者有所启发。

第二编“全球化与文化”粹集了中西方学者的七篇文章,读者不难看出,各位作者讨论都是在同一层次上进行的,因此这样的对话比较集中,且有明确的针对性。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全球化所隐含的美国价值取向提出了批判,“当我们谈论全球化不断扩展的权力和影响时,我们实际上想到的是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当我们谈到民族—国家的削弱时,我们实际上想的是其他民族—国家的削弱,很可能它们的削弱是因为美国的权力,或者因赞成——合作或有意服从——而削弱,或者因各种残酷的力量和压力而削弱。这里在焦虑背后形成的东西,是过

去所称的帝国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本身已经经历了各种不同的体现”。关于全球化在文化中的表现,詹姆逊认为,“在我们谈到文化时,是否民族主义问题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是惟一面临危险的东西?并非如此,因为这里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其中文化和民族(或种族-民族)与流行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对我们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这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显然,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詹姆逊为代表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是看得很清楚的。

王宁的文章直截了当地论述了全球化的日益近逼以及可能出现的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但他这篇文章的关注点主要的影视传媒,“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全球化的进程则体现在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长驱直入和国产影片的节节溃败”。但他同时也指出,“正如全球化已经对我们的社会文化各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样,它对我们的娱乐生活也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当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传播媒体的更新以及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等方面。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和审美有了不同的要求,这样一来,相对于文学,曾经有过自己黄金时代的电影所受到的挑战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他的结论并不悲观,而是对未来的文学及影视传媒的功能有着清晰的把握。盛宁的文章针对王宁近几年来所发表的论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二者的结论并不矛盾:都认为那种趋同性的“文化全球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文化总是千差万别的,文化的多元走向应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本书之所以收入盛宁发表于两年前的文章,是想让读者了解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各家之言,以便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张颐武则富于想象力地将全球化



理论和现象用于具体的中国文学作品分析中,使读者体会到,不同的作家对全球化已经有了自己的不同态度,他们虽未在理论上作出阐述,但却已经以文学作品的叙述形式表明了态度。

特里·伊格尔顿虽未直接论述全球化问题,但他所指出的文化概念的无限扩张现象显然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不管多么神经质的热衷于自我创造的社会都毫无保留地试图否定这一点。文化也总是可以十分接近舒适安逸。如果我们不将其置于一个启蒙的政治语境中的话,它的亲和性就有可能发展为病态和迷狂状态,因为这一语境能够以更为抽象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为慷慨大度的从属关系来孕育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这种激烈的批判态度虽然近乎偏激,但却对那些无限滥用文化概念的作法不啻是一副清醒剂。

J. 希利斯·米勒的文章最初以中文的形式发表时曾引起中国学者的争议,今天我们重读这篇文章便不难看出,他并非一位文学悲观论者,而是认为文学的作用不可被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他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anachronistic)。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有繁荣的时期。这就赋予了黑格尔的箴言(dictum)另外的涵义(或者也可能是同样的涵义):艺术属于过去,‘总而言之,就艺术的终极目的而言,对我们来说,艺术属于,而且永远都属于过去。’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包括文学